

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研究*

吴桂兵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animal mask, which was placed on structural member, was applied not only in eaves tile but also painting, brick and so on. We can district it into three regions: Beifang, Nanfang and Liaodong. The period of the animal mask in Beifang was distributed in Western Jin, Eastern Jin in Nanfang, but from Western Jin to Eastern Jin in Liaodong. It originated in Han dynasty and spread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 (Luoyang) to all around, its function evolved from avoiding evil spirits, being celestial being for the dead to being related to the reality, its regional development k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arly stage of Taoism.

Key words: Liangjin period Structural member Animal mask Early stage of Taoism

内容提要 东晋建康兽面瓦当来源于西晋,其源头当在中原洛阳地区新莽时期的壁画兽面。汉晋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使用经历了从地下墓葬到地面建筑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汉晋墓葬制度的区域变化有关,其根源在于早期道教的发展。

关键词 两晋时期 建筑构件 兽面 早期道教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近来,南京地区六朝瓦当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兽面纹瓦当,多有学者述论^[1],其主要特征即是在当面饰以正视的兽面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以往研究基本局限在瓦当器类,未能将其置入建筑构件中的兽面这一背景中进行论述,因而一些问题仍有再探讨的必要。基于此,本文综合南京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对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兽面的类型、地区特征及使用内涵等问题展开论述,进而梳理其在汉晋变迁考古学研究中的地域意义,不当之处,敬祈学界指正。

—

考古发现的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主要使用在彩绘砖画、瓦当、墓砖、壁画以及石龕(椁)等上面,发现地点有甘肃、北京、江苏等省市。

现略述如下。

(一) 甘肃地区

两晋时期甘肃地区的兽面材料主要见于该地区的彩绘砖画墓。河西地区历年发现的彩绘砖墓已有一定数量,其面貌总体差异不大,地区特色的连续性也较强,于兽面题材的介绍而言,以嘉峪关和敦煌佛爷庙湾的材料为佳。现略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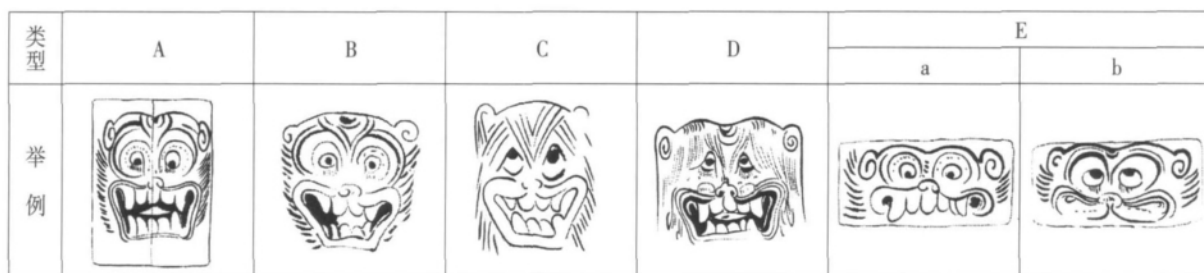
1. 嘉峪关彩绘砖画墓

嘉峪关画像砖墓材料据《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2],报告的8座墓葬中,除M2和M8外,余6座均有彩绘砖画,其中的M3、M5和M6的墓葬彩绘砖画中有兽面题材(报告称虎头纹)。

M3 在墓门之上堆砌有照墙(报告称门楼),其上饰有兽面纹、云气纹,以及一些托梁兽等题材的砖雕等,因壁画模糊不清,故兽面形制不明。

收稿日期 2008-04-05

* 本课题研究得到“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丧葬:从晋制到唐制的考古学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 07JJD780121)的资助。



图一// 甘肃地区兽面类型(据《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

M5 由墓道、短甬道以及前后两个墓室组成。该墓彩绘砖画保存较好,在墓门照墙和墓室壁上均装饰有兽面题材的彩绘砖画。照墙上的兽面砖画具体不明,唯墓室中的砖画介绍较详细,前室的东壁和西壁各有两幅装饰性兽面砖画,东壁兽面均无下颌,巨口无齿,弧额两侧有一对圆圈状小耳,圆眼有睛;西壁两幅彩绘兽面亦无下颌,无耳,巨口下有巨齿,弧额、圆眼有睛。

M6 在照墙未内收的拓切砖侧绘有兽面。

2. 敦煌佛爷庙湾彩绘砖画墓

敦煌佛爷庙湾彩绘砖画墓的材料据《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3]报告的6座彩绘画像砖墓中,四座有彩绘兽面,分别是87DFM133、95DFM37、95DFM39及95DFM118,共54幅彩绘兽面,报告将它们分出五型,其A型为凹额,小

耳;B型为弧额;C型为弧额,倒三角形额斑,面髯下垂;D型为凹额,大垂耳,面髯下垂;E型无下颌(前述嘉峪关M5墓室兽面与此型同),据有无巨齿,又分两亚型,Ea型有巨齿,Eb型无巨齿(图一)。

各型兽面主要位于照墙和墓室内,墓室兽面位于墓室四隅,均为E型。照墙兽面分布情况相对复杂,有位于仿木建筑之斗面的,有位于柱间的,亦有位于拱或枋之间的(图二)。从类型而言,有均为E型的,有E型和A、D型同出的,亦有均为完整兽面的B型和C型同出的(表一)。除E型外,其他各型均成对出现,这也说明墓葬建筑上在使用各型兽面的差异,E型的出现位置及简洁的彩绘说明其装饰的意味,而A、B、C、D型基本为成对出现,成为墓葬建筑构件上兽面的主要表现类型。

(二) 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的兽面材料发现于石景山八角村的一座壁画墓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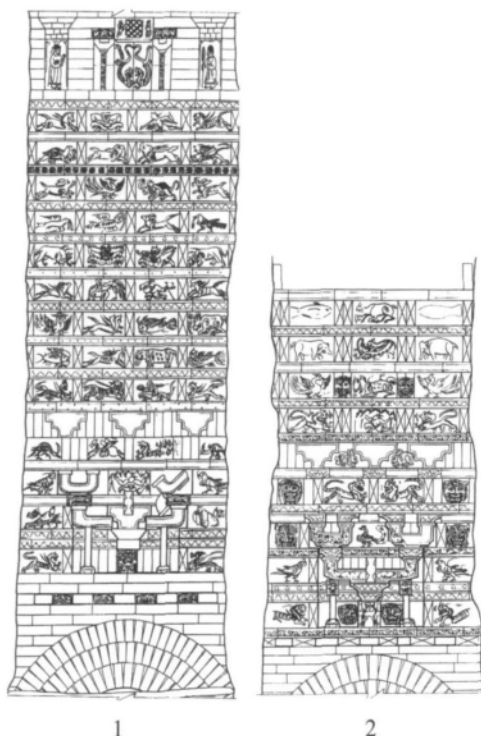
该壁画墓由砖砌券顶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内搭建一石龕(椁),兽面即位于此石龕(椁)上。石龕(椁)由后壁、左右壁、地板、顶板五块石板组成,无前壁,在前檐檐部正面刻绘5个兽面和4个红色的图案,屋脊的四角也雕有兽头,5个兽面表示的应是瓦当(图三)。

(三) 江苏地区

表一// 佛爷庙湾兽面类型与建筑位置对应

墓葬单位	照 墙					墓室四隅
	檐头	斗面	枋(拱)间	柱间	其他	
87DFM133	Ea(4)*	Ea(4)				Ea(3)Eb(1)
95DFM37	Ea(5)		D(2)	A(2)		Ea(7)Eb(1)
95DFM39	Ea(5)		A(2)	A(2)		Ea(8)
95DFM118			C(2)	B(4)	B(2)	

* 英文字母表示兽面类型,括号内数字表示幅数。



图二// 照墙兽面分布图

1. 敦煌佛爷庙湾 M133 2. 敦煌佛爷庙湾 M118



图三//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壁画墓石龛(樟)

该地区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主要发现于南京、镇江及徐州等地,以南京地区的材料较丰富、系统,徐州和镇江两地的材料相对较少,且形制单一。

1. 南京

目前,南京地区发现的此类材料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兽面纹瓦当,其二为墓砖。

兽面纹瓦当的材料主要集中在贺云翱和王志高、贾维勇的论著中,他们对瓦当的分类其实就是对当面所饰兽面的划分。

贺云翱将南京市发现的兽面纹瓦当分出五型(图四),其中的A型又分出I、II两式,B型又分出Ba、Bb两亚型。A型I式为东晋早中期,A型II式为东晋中晚期,B型的时代定在南朝,C型瓦当的时代上限定为东晋、下限定为南朝,D型的时代初步认定为不晚于南朝早期,E型瓦当的时代为南朝中晚期^[5]。

王志高、贾维勇将南京市基建工地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分为六类,第一类具人面向兽面过渡的特点;第二类兽面特征比较明显,多有对称的一对小耳,个别的当面边缘饰有一周锯齿纹带;第三类兽面有一周封闭完整的轮廓线,亦有两对称小耳;第四类兽面下部有半封闭的轮廓线,未见双耳;第五类兽面无轮廓线,亦无双耳;第六类整体与前五类有较大差异,兽面均用凸浮雕表示。对于各类时代,他们认为,第一、二、三类主要流行于东晋早中期,大量出现的第四、五类主要流行于东晋中晚期至南朝早期,第六类凸浮雕兽面纹瓦当使用于南朝中晚期^[6]。现将王、贾两位先生的分类与贺云翱先生所作的划分对照如(表二)。

通过比较,在类型划分上,贺云翱比王志高、贾维勇多出D型和B型II式,王志高他们比贺云

表二// 南京地区六朝兽面瓦当类型划分比较

贺云翱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I式	II式	I式	II式			
王志高 贾维勇	三类	四类	五类		一类		六类

翱多出第二类,在相对时间区分上,贺云翱先生的A型的I、II式与王志高他们的第三类和第四类大体吻合,即处于东晋时期,贺云翱的E型与王志高他们的第六类亦吻合,即处南朝中晚期。区别在于贺云翱的B型推定在南朝,而王志高他们类似于其I式的第五类推定在东晋中晚期至南朝早期,贺云翱的C型推定在东晋至南朝,而王志高他们却是东晋早中期,且是其所划分兽面类型中序列最早的。

综之,属于本文讨论范围的有贺云翱划分的A型和C型以及王志高、贾维勇划分的第一至五类,时代基本在东晋。

南京地区墓砖兽面材料见于迈皋桥万寿村M1,即万寿村永和四年(348年)墓,兽面出现在墓砖短侧面,整体近似椭圆,面缘有明显轮廓线,面部双眼圆睁、眼珠暴出、口大张、露齿,额以上及下巴部位不见^[7]。

2. 镇江

镇江地区的兽面纹瓦当发现有一定数量,发展的序列也比较清楚,镇江古城考古所的报告将其分为七型16式,其中的B型兽面特征为杏仁形眼,面缘有框线,边缘加饰一周凸弦纹及三角纹,报告推断此型时代在东晋至南朝早期^[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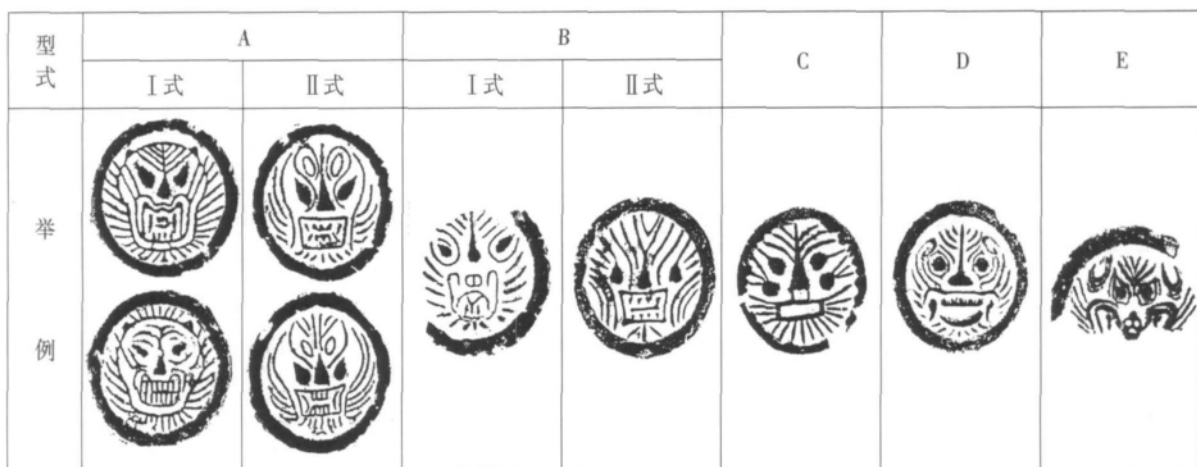
3. 徐州

徐州地区发现的此类材料均兽面纹瓦当,出土于该市金地商都遗址一魏晋时期的灰坑内,有大小两种,瓦当外沿均凸起,当面所饰兽面双眼圆睁,口部表现较为夸张,上下两排牙齿出露,较狰狞^[9]。

二

上述兽面材料的分类描述以所在地区材料为限,故未能对两晋时期兽面材料进行整体分析。下文将从兽面所在建筑、图像构成及形制特征等方面,整体观察两晋时期各地区建筑构件上的兽面,并试作分类、分区。

从所在建筑而言,两晋时期兽面可以分出地面建筑及墓葬所用两类。地面建筑所用均为实用瓦当,主要发现在南京及其附近的镇江、徐州等



图四// 南京兽面纹瓦当类型(据《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地,目前尚无具体遗迹公布,故不知为何类建筑。同时,瓦当除当面纹饰分类描述外,对瓦当本身形制亦无甚介绍,故也不能延伸开来了解使用建筑的具体部位,即是否均用于瓦头。墓葬建筑使用兽面主要出现在河西、北京等地区,河西地区出现在墓葬照墙和墓室四隅,以彩绘砖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北京地区则刻绘于石龕(椁)的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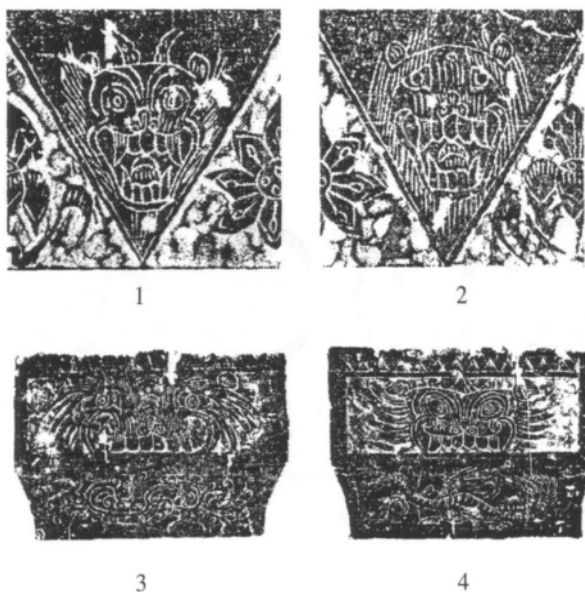
从图像构成考虑,两晋时期兽面可以分出不完整和完整两类。不完整兽面少下颌及下齿,如《敦煌佛爷庙湾》报告中所划分的E型,以及南京迈皋桥万寿村永和四年墓墓砖所饰兽面,此类兽面均出现在墓砖侧面,所在位置有照墙和墓室;完整兽面即《敦煌佛爷庙湾》中的A、B、C、D型,北京石景山八角村石椁(龕)墓檐部所刻绘兽面,以及江苏南京、镇江和徐州等地发现的瓦当兽面。

从兽面形制特征考虑,两晋时期兽面亦可以分出两类。《敦煌佛爷庙湾》报告将兽面分出五型,其中E型又分出两亚型。其实,根据兽面眼睛的圆形和三角形,及须髯上耸、下垂,可将其分出两类:第一类为圆睛、须髯上耸,包括《敦煌佛爷庙湾》的A、B、E三型;第二类为三角形眼、须髯下垂,如《敦煌佛爷庙湾》中的C、D两型。南京地区的瓦当兽面亦可根据口部形状的不同分出两类:第一类为凹形口,如贺云翱所划分的A型I式、B型I式;第二类为矩形口,如贺云翱所划分的A型II式和B型II式。两个地区的两类兽面亦可根据额顶的弧凹、额斑的不同而可细分,但终不出两类兽面。同时,我们注意到敦煌地区的第一类与南京地区的第一类,敦煌地区的第二类与南京地区的第二类,在形制特征上有相似性的联系,特别是南京万寿村永和四年墓中的兽面兼具两地区第一类

兽面的特征。

据发掘报告,嘉峪关砖画墓可分出三组,其时代大致在曹魏至西晋,年代先后排列为M2—M1—M5、M4—M3—M6—M7—M8,其中M1段清墓为甘露二年(257年),已是曹魏末年,这样,出有兽面的M3、M5及M6时代可推断在曹魏末期至西晋。敦煌佛爷庙湾的6座彩绘砖画墓,报告推断其时代均属西晋早期,但从随葬器物观察,一些墓葬的时间可能要稍晚,如M133的圆形陶盘,与敦煌祁家湾纪年墓材料相比,当不会早到西晋早期,但佛爷庙湾亦不出祁家湾五凉时期的圆形多子缝^[10]。如此,河西甘肃地区的兽面时代可断为曹魏末期至西晋。北京石景山八角村壁画墓的时代,报告初步推测为魏晋,但据形制还可进一步细化。该墓为砖砌前后室墓,前后室均券顶,且有甬道相连,与顺义大营村的两面坡式结顶,前后室间及甬道的侧壁成一直线,已明显不同。大营村M8有泰始七年(271年)的纪年,其甬道、墓室的侧壁成一直线^[11],天津东汉鲜于璜墓^[12]、北京平谷的东汉墓^[13]亦为此形,可见北京地区的西晋墓延续了该地区东汉墓葬的形制特征,而八角村壁画墓的前后室形制已与洛阳地区典型晋墓^[14]相似,故其时代当晚于大营村西晋墓。同时,八角村墓中石椁(龕)绘墓主与辽阳汉魏晋壁画墓、高句丽壁画墓一致,其石椁(龕)当为帐或屋宇,墓主手持饰兽面麈尾与朝鲜冬寿墓相似,冬寿墓纪年为永和十三年,即公元357年^[15]。如此,八角村壁画墓的时代可断在西晋或稍晚。

此外,在辽阳棒台子二号壁画墓^[16]、朝鲜安岳冬寿壁画墓^[17],以及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18]中均发现饰于建筑构件上的兽面。



图五// 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兽面
1、2. 横额上兽面 3、4. 枅斗立面兽面

辽阳棒台子二号壁画墓为带前后廊、耳室的石室墓,墓内有石柱,上托枅斗,兽面绘于枅斗立面,圆睛、须髯上耸,无下颌。该墓形制与辽阳三道壕太康十年(289年)墓^[19]相似,其时代当相近。朝鲜安岳冬寿墓亦为带廊道、耳室的石室墓,其前后室之间有3个八角形石柱,柱上承枅斗,枅斗立面彩绘兽面,形制与辽阳棒台子二号墓相似,冬寿墓有墨书题记,有永和十三年纪年。冬寿本前燕慕容皝司马,后投降慕容仁,仁兵败后,冬寿又投奔高句丽,其墓与辽阳地区魏晋墓亦为相似^[20],故本文将其与辽阳地区的材料一并考虑,统称辽东地区壁画兽面。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为多墓室石室墓,在其前室北壁上横额、前室八角擎天柱蜀柱、拱、枅斗等上面均刻绘有兽面。具体如下:

前室北壁横额 25 幅,均为完整兽面,据眼睛,可分圆形、三角形两类。前室八角擎天柱上蜀柱的东西两面各刻绘完整兽面 1 幅,圆眼圆睛;柱上所托拱的南北两面各刻绘完整兽面 1 幅,三角形眼。枅斗的东西立面各绘不完整圆眼圆睛兽面 1 幅;枅斗的南北两立面各绘不完整三角形眼兽面 1 幅(图五)。

对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的断代,争议较大,主要集中在东汉晚期、魏晋以及西晋等^[21]。该墓出土的兽面有不完整和完整、圆眼圆睛与三角形眼之分,与河西地区西晋墓中的彩绘兽面相似,同时,墓中出土的陶器多泥质灰陶,如陶案,这与南

京地区东晋早期较大型墓中出土器物相似^[22],如果再考虑到该墓为抹角叠涩顶,将该墓时代推断在西晋或稍晚应较合适。

这样,再考虑到南京地区东晋的瓦当兽面,我们将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分出三区,即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以及辽东地区(表三)。

北方地区的兽面材料主要包括甘肃彩绘砖画墓、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及北京地区石椁(瓮)檐部的刻绘兽面,均用于墓葬建筑,位置有照墙(沂南画像石墓横额类似)、立柱、蜀柱、枅斗及墓室四隅等。该地区兽面从图像构成观察,有不完整和完整兽面两类;从面部特征观察,有圆眼圆睛和三角形眼之分。各类兽面均凹形口,时代可大致推定在西晋。

南方地区的兽面材料除迈皋桥永和四年墓外,余均饰于瓦当当面,除南京外,尚有镇江和徐州。该地区的瓦当兽面均使用于地面建筑,形制完整,有凹形口和矩形口之分,时代断在东晋。

辽东地区材料包括辽阳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及朝鲜安岳冬寿墓,均用于墓葬建筑,均为不完整兽面,圆眼圆睛,须髯上耸,涵括西晋和东晋两个时期。

三

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兽面的分类、分区使我们无法回避西晋和东晋两个时期,北方、南方以及辽东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关联,如此,就必须考虑其源流及使用内涵。

(一)来源与地区发展

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当来源于东汉,可资材料有三:其一为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其二为洛阳偃师新莽壁画墓;其三为北京怀柔城北 M31。

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为多室砖墓,前后室均绘彩画及梁架枋柱等仿木结构,柱顶上托枅斗,彩绘兽面即位于这些斗子的立面,兽面均圆眼圆睛,下颌部位未见,图案的程式化比较明显^[23]。洛阳偃师新莽壁画墓为空心砖墓,前后室间有勾栏门式建筑,有立柱,柱上托有横额,其上即绘有兽面,兽面双耳,圆睛^[24]。北京怀柔城北 M31 为多室砖墓,墓内出土陶楼 1 件,已残,但上层保存完整,为庑殿式顶,瓦垄头有兽面纹圆瓦当,垂脊四条,前坡两条脊头亦有兽面纹圆瓦当,底层檐头亦有圆形兽面纹瓦当,可惜的是报告对兽面特征未作报导。该墓除陶楼外,还出土了汉初平式罐、踏碓俑等,因而报告将该墓时代推断在东汉晚期可信^[25]。

表三// 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分区

分区	具体地区	分 类				期
		建筑性质	图像构成	形制特征		
辽东	辽阳	墓葬建筑	不完整	圆睛 须髯上耸		西晋 东晋
北方	甘肃 北京 山东	墓葬建筑	不完整 完整	圆睛 须髯上耸 凹形口	三角形睛 须髯下垂 凹形口	西晋
南方	南京 镇江 徐州	地面建筑	完整	凹形口	矩形口	东晋

汉代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与两晋时期的比较而言,从所在建筑性质考虑,汉代兽面均安排在墓葬地下建筑,西晋的情况与汉代一致,东晋时期南方地区的材料却使用于地面建筑,辽东地区的墓葬兽面却一直使用到了十六国(东晋)时期;从兽面的图像构成考虑,汉代兽面有绘于柱斗立面的不完整兽面和额枋上的完整兽面,西晋时期的山东、甘肃、北京等地区继承了这一传统,辽东地区从西晋到十六国时期均为不完整兽面,南方地区东晋时期的材料则基本为完整兽面;此外,汉代兽面用于斗面、枋、瓦头等构件上,两晋时期与此一致。如此,汉晋兽面的传承则很明显,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使用兽面当来源于汉代。

兽面最早以壁画的形式出现于洛阳地区新莽墓葬,东汉晚期以饰于陶楼明器的形式出现于今天的北京地区,但到了西晋时期,洛阳及其附近的地区却不见兽面的使用,而在其周边的山东、甘肃以及北京等地区却较多发现;东晋时期北方此类材料不见,南方以南京及附近的徐州、镇江等地的材料发现较多,辽东地区则涵盖两晋时期,从西晋一直到十六国均有发现。汉晋兽面的地区演变与汉晋墓葬制度的变化及地区发展存在必然关联。

汉晋各区域的发展变化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然墓葬制度的变化是分析汉晋兽面地区发展的直接角度。魏晋倡导薄葬,都城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墓葬已与东汉时期不同,形制从东汉的多室发展到西晋时期的前后室及单室,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器类亦趋简化,在这种薄葬的氛围下,壁画墓也不再使用^[26],如果说在中原地区连壁画墓都不使用了,又如何在墓葬中装饰兽面呢?而如河西这样的周边地区,却不成问题,它们在汉末至西晋,因为局部的安定,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向这里迁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代墓葬制度的传统,也使

得壁画墓得以使用,同时,新形成的魏晋墓葬制度传播到这些地区也有一个过程,这样,绘于墓葬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亦得以延续。永嘉之乱后,中原战乱,其周边地区墓葬逐渐采用魏晋墓葬制度,表现出来的是单室墓的大量出现,墓葬建筑的简化,墓葬制度的变化导致原来壁画墓中的兽面亦不复出现。辽东地区却一直有使用汉代墓葬壁画兽面的传统,以迄十六国时期,这与该地区中原地区人口的不断迁入,东汉时期的墓葬制度某种程度上一直流行到东晋时期相一致,如多墓室形制等^[27]。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兽面的使用从用于墓葬地下建筑发展到地面建筑,其原因一方面恐与两晋之际,该地区大量中原北方地区人口迁入,带来了汉晋使用兽面的传统有关,如南京迈皋桥万寿村永和四年墓中的不完整兽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南方地区兽面的变化源于其使用功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恰恰反映了早期道教发展的不同阶段。

(二) 内涵与功能演变

欲明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兽面的内涵,兽面为何兽之面是关键。

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一般认为是虎面和狮面,虎面对应的形制特征是圆眼圆睛,狮面对应的特征是三角形眼,但也有学者笼统称之为神兽之面^[28]。将圆眼圆睛之兽面视为虎面如前述敦煌佛爷庙湾87DFM133,其所用均为不完整的圆眼圆睛兽面,形制特征与该墓饰门虎虎面一致,指代明确。三角形眼之兽面指代则相对复杂,认为是狮面者亦不无道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墓出土了两石座,报告认为其一为虎形,另一个就认为是狮形,其三角形眼、须髯下垂,与本文区分的三角形眼、须髯下垂之兽面特征一致,该墓时代推定在东汉中期偏晚^[29]。司马彪《续汉书》记载了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枝事^[30],如此,将三角形眼、须髯下垂之兽面视为狮面亦可,但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的材料却显示出其指代的复杂。

在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前室北壁横额边饰三角纹中,填绘有圆眼圆睛及三角形眼两类兽面,其横额主体则刻绘有奇禽、怪兽、灵异等物,为圆眼圆睛之兽面者有虎、六足鱼身异兽等,为三角形眼之兽面者均为兽首人身执兵器之怪兽(图六)。前室八角擎天柱上拱的南北两面亦对应地绘有此怪兽,面部形制与拱上侧单幅兽面一致^[31],孙作云先生认为它们是大雉中的十二神兽^[32],如此,两晋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兽面指代就很复杂了。

但无论兽面指代如何复杂,其对虎的指代却一直从汉代延续到两晋,我们从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到甘肃地区的彩绘砖画,再到南京地区的瓦当兽面,均可以看到虎面的特征。如此,我们可单依“虎”的信仰内涵来考虑汉晋兽面的信仰历程。东汉时人以虎为勇猛之物,可以之食鬼。《风俗通义·祀典》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33]王充在讥评为宅解除时提到“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不敢妄集。”^[34]由此可见,建筑中画出虎面其内涵当与虎的凶猛可以正鬼食鬼有关。此外,虎还能助人避邪升仙。如洛阳烧沟东汉墓中出土的规矩镜(21:34),其铭文曰:“福祿进兮日以前,天道得物自然,参驾蛮龙乘浮云,白虎失,上太山,风鸟下,见神人。”^[35]洛阳西郊东汉早期墓中亦出土一件带铭文规矩镜,其文曰:“福祿进兮日以前,食玉英兮饮澧泉,驾文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36]正因为有避邪、升仙的功能,虎逐渐被早期道教所采用,如东汉时期的西王母多有龙虎座^[37]。虎亦与道士的神仙活动相关,葛洪在《神仙传》里记载了神仙茅君道成后与父母宗亲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幢幡盖旌节旄钺如帝王也,参驾龙虎麒麟白鹤狮子,奇兽异禽不可殚识。”^[38]

正是因为虎与早期道教发展的关系,到了东晋时期,早期道教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关注墓中解除、墓主升仙到生者服食升仙,贵族上层及一些世家大族开始信仰道教^[39],与之相伴的是对虎的信仰和使用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虎与现实生活中的困厄、道士及天之使者关联^[40],表现出来的就是汉至西晋时期兽面用于地下,到东晋时期一改旧的传统,大多用于地面建筑,兽面瓦当成为主要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道教在汉晋时期的地区发展基本与汉晋兽面的地区分布亦相一致。东汉时期,早期道教在洛阳地区逐渐形成,反映道教教义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也在该地区出现,肥致碑所载肥致经历及师承关系,更是说明了该地区道教发展的状况^[41],与此相应的是,建筑构件中的兽面也在此地区出现。魏晋时期,洛阳地区的道教发展受到限制^[42],而山东、河西等却是道教活动的主要地区^[43],辽东亦有不少自河北、山东地区迁徙而来的士族^[44],道教有可能影响到了该地区,此道教的地区发展状况与西晋时期建筑构件中兽面的分布基本一致。永嘉之



图六// 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石刻神兽

后,随着大量的中原北方地区人士南迁,特别是东晋王公贵族的追崇,使道教在南方得到了较大的发展^[45],以建康为中心的地区也就出现了兽面瓦当。

由此可见,汉晋兽面的发展反映了汉晋道教发展的阶段性,而这种变化也正是汉晋变迁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最后,我们谈谈兽面所在建筑的性质。从汉到西晋,兽面基本使用于地下,或以墓室建筑构件装饰出现,或以随葬明器的构件出现,这是否与道士活动的“道室”、“石室”有关呢?因其均用于墓葬,应与墓葬的避邪解注,及为死者的升仙服务等有关,然东晋兽面瓦当均为实际建筑所用材料,考虑到东晋道教的发展,那么,其所在建筑是否与道教有关呢?《晋书·许迈传》载许迈与王羲之书中写道:“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其在余杭亦立有精舍^[46]。又葛洪记载其先师所说太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魁……帟帟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47]如此可见,道教建筑虽有虚幻的想象,然现实生活中亦有真实存在,如果兽面瓦当确与道教精舍等建筑有关,则对其所在建筑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于道教建筑史、道教考古学的研究,当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1][5][6] 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贺云翱:《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文物》2003年第7期;王志高、贾维勇:《六朝瓦当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兽面纹瓦当再探》,《考古与文物》

- 2004年第4期;刘建国、潘美云《论六朝瓦当》,《考古》2005年第3期;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
- [2]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 [4]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
- [7]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5期。
- [8]镇江古城考古所《江苏镇江市出土的古代瓦当》,《考古》2005年第3期。
- [9]刘尊志《徐州出土晋代记事碑及相关问题略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
-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
- [1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 [12]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 [13]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5期。
- [14]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
- [15][17]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 [16]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
- [18][31]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
- [19]辽阳博物馆《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 [20]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 [21]发掘报告推断该墓时代为东汉晚期或稍晚,参见注18,魏晋说见安志敏先生的《论沂南画像石墓的年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西晋说见李文信先生的《沂南画像石古墓年代的管见》,《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 [22]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 [23]洛阳博物馆《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 [24]辽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偃师县新莽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
- [2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 [26]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
- [27]北京大学考古系《魏晋南北朝考古试用讲义》,1974年2月。
- [28][32]孙作云《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兼谈汉人的主要迷信思想》,《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 [29]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 [30]《初学记》卷二九《兽部》,中华书局2004年,第697页。
- [33]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第368页。
- [34]《论衡·解除篇》,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
- [35]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
- [3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 [37]《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图像材料与道教》,张勋燎、白彬合著《中国道教考古》第六篇,线装书局2006年。
- [38]《神仙传》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9册,第280~282页。
- [39]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编《汉魏晋南北朝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 [40]《太平御览》卷八九二引《幽明录》、《搜神记》及《续搜神记》。
- [41]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 [42]《晋书·礼志》记载武帝泰始元年(265年)下诏“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祁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中华书局1974年,第600~601页。
- [43]山东地区道教状况可参考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其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河西地区汉末魏晋道教发展可参考王卡《汉末魏晋河西道教的传播》,载其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44]《晋书·慕容𪎭载记》记载“时二州倾覆,幽冀沦陷,𪎭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𪎭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6页。
- [45]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载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 [46]《晋书·许迈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6~2107页。
- [4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八《地真》,中华书局1985年,第324页。